

# 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訪問瑣記

陳宗仁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筆者去(2005)年蒙歐洲文教交流基金會贊助旅費，並獲得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雷哈諾(Hanno Lecher)館長、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蘇桂枝編輯的協助，前往萊頓大學進行短期訪問。本文即就訪問期間的見聞，草綴成文，也許有助於讀者了解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部分館藏內容。

萊頓大學漢學院(Sinologisch Instituut)是歐洲著名的漢學研究中心，早期一些著名的漢學家，如施利加(Gustaf Schlegel, 1840-1903，或中譯為施萊格)、高延(J.J.M. de Groot, 1854-1921)均為該院教授。筆者就讀博士班時，曾閱讀荷蘭漢學家有關東南亞華僑的相關研究，如「天地會」、「公司」等華僑組織的著作，加上筆者研究領域為臺灣早期史，既已數次前往西班牙搜集資料，卻遲延未至荷蘭參訪，心中頗以為憾，所以此回有機會前往訪問，心情格外興奮。

筆者向基金會申報的訪問計畫是有關東南亞華人史料的調查，特別是與閩南人有關的文獻，由於目前臺灣島上的福建人後裔甚多，有人估計佔全

島住民70%以上。在16、17世紀時，已有福建人前來臺灣島，但大量的移民出現在18、19世紀，而福建人大量移往東南亞各地，在時間上，約略與移往臺灣相等，甚至比前往臺灣島的時間更早。

筆者就讀碩士班時，研究18世紀漢人移往臺灣的歷程，寫成碩士論文「漢人移墾及其市街形成」以18世紀的新莊街為例所作的個案研究，並先後參與一些臺北盆地地方志、古蹟的調查與撰寫，這些研究都在探討閩粵漢人在臺灣(臺北盆地)移民、開墾的過程。而漢人在東南亞各地的移墾情形，自亦為筆者所關心。

荷蘭人從16世紀末到東亞海域各地貿易，17世紀時，以爪哇島的雅加達(巴達維亞)為據點，在東亞各地經商、設立商館和殖民地，與漢人多所接觸，而這些漢人有不少來自閩南。

其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799年解散，其在東亞的殖民地後來由荷蘭王國統治，使得荷蘭政府要管理東亞殖民地裡的華人，另一方面，荷蘭與清朝中國的來往日益密切，於是出現了所謂的「漢學研究」。1874年施利加被任命為萊頓大學漢學教授，在此之前，他在巴達維亞的荷蘭東印度殖民地政府工作了11年，擔任當地的漢語翻譯，通曉福建話。(註1)他與後來繼任為漢學教授的J. J. M. de Groot均關心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研究，如前述天地會(註2)公司等社會組織的探討。

上述研究是荷蘭統治者所關心的，但這些研究不純然是為政治服務，而是有其學術價值；這些漢學家見到了荷蘭東印度政府收集的中文珍貴資料，介紹了當時學術不太注意或重視的華人組織。

對臺灣史研究者來說，福建人在18世紀前往臺灣島或爪哇島經商或居住，在不同地域的福建人社會究竟有什麼樣的轉變或相同的發展，是件有意

【他山之石】



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外觀



思的問題。

由於這些漢學家不僅從事華人研究，亦廣泛收集華人資料，這些資料百年後可能歸萊頓大學收藏，而這幾年國內臺灣史學者前往荷蘭，多著眼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焦點是集中在 17 世紀的臺灣早期史；但荷蘭萊頓大學收藏了哪些東南亞華人史料，似乎值得前往瞭解，於是筆者前往荷蘭之前，內心是做如此的盤算。

此次訪問，同行尚有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的康培德教授，康教授因執行國科會計畫而前往蒐集資料。我們到了萊頓大學，拜訪雷哈諾館長後，承蒙館長厚意，得以進入漢學院圖書館的書庫，便利查閱資料。

關於萊頓大學漢學院和圖書館，前漢學院圖書館館長吳榮子曾有文章介紹（註 3），可參看。漢學院及其圖書館雖成立於 1930 年，但其藏書來源可追溯至 19 世紀或更早。1930 年漢學院成立時，圖書館約有中文藏書 850 種，多為線裝書；至 1984 年時，中文圖書已有 20 萬冊，目前約為 25 萬冊，與歐洲主要大學相比，中文藏書至為豐富。（註 4）

現任館長雷哈諾，原先任職於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目前為萊頓大學漢學院博士生。在雷館長之前的館長，先後有馬大任、吳榮子；吳榮子館長於 2002 年底退休後，曾由田海（Barend J. ter Haar）教授代理，到了 2003 年 11 月，由雷哈諾接任。

以下是在漢學院圖書館館藏的片段見聞，主要是與筆者興趣有關者，略述如下：

## 一、中文線裝書的收藏

萊頓大學最早的漢學教授施利加在 1883 年、1886 年兩次編纂萊頓大學收藏中文書目錄，在目錄中提到，當時的收藏主要來自荷蘭某些圖書館的舊藏，以及 J. J. Hoffmann 教授、曾在日本工作的 von Siebold 博士，以及 M. E. J. Brill、高延等人的藏書，總數有 2 百餘種，均是 19 世紀線裝的中文書。在一些線裝書中，可以看到一些藏書印或署名，如「施利加」、「高延」、「墨湛」等。（註 5）

其中有些書與臺灣有關，如有一部余文儀的

《續修臺灣府志》（註 6），另有一部周凱的《廈門志》，應是道光 19 年（1839）的原刻本。（註 7）另外，在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萊頓大學圖書館收藏一部 Tung Cheng Chi，這部書是 19 世紀下半葉一位漢學家 De Grijns 的藏書，記載 18 世紀臺灣的一場叛亂（註 8），此行未查閱此書，唯據其拼音，應是藍鼎元的《東征集》。（註 9）

上述幾部書在臺灣均有收藏，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收藏有雍正十年（1732）刊刻的《東征集》；這些書亦有現代的鉛字本，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即刊印前述 3 書。另外，漢學院圖書館收藏有清乾隆年間（約 1770 年前後）薛起鳳、楊國春及黃名香等人輯纂的《鷺江誌》殘本，此書僅見於此，彌足珍貴。（註 10）

漢學院圖書館在 20 世紀最大筆的收藏，是購入著名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 van Gulik, 1910-1967）的藏書，約有 2 千 5 百種，近 1 萬冊，多半是與傳統中國有關的文學、藝術、音樂書籍。

在 1980 年代中期，又有印尼華人吳氏家族的藏書入藏，係由吳氏家族後人捐贈。書籍原本的所有者為 Go Sian Lok（1874-1943），是所謂的 Peranakan，即在印尼出生的華人。吳氏家族祖籍為福建海澄，18 世紀下半葉 Go To（人名）至爪哇島，擔任華人子弟的教師；其第二代經商，Go Sian Lok 屬於第三代。（註 11）

吳氏藏書共有 284 種，歸納其藏書內容，主要為四書、五經之類與科學考試有關的書籍、如《四書補注附考備旨》、《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之類；又有命相、輿地之書，如《增補星平會海全書》之類；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書籍，如《詳註通用尺牘》、《增訂圖註本草備要》；傳統小說，如《繡像木蘭奇女傳》、《新刊再生緣全傳》。此外，亦有幾部善書，如《大聖末劫真經協天大帝》、《增繪全圖玉歷寶鈔勸世》等。

上述書籍的出版地多半為在中國大陸沿海城市，如廈門（文德堂、多文齋）、泉州（同文堂）、上海（章福記、錦章圖書局）、福州、廣州等地，少數如長沙廣益書局等。（註 12）

這些書籍類別大致可以反映 19 世紀海外一般富有的華人家庭藏書或閱讀範圍（註 13），各種小說是所謂的閒書，而命相、通書、尺牘寫法之類的書籍則是日常生活所需，至於科學用書是一般讀書識字人所必讀。

筆者前於國家圖書館任職期間，曾隨閱覽組同人至澎湖縣文化局訪求地方文獻，該縣文化局即收藏類似的書籍，根據當時抄寫的筆記，除有多種善書、醫方之外，另有如廈門會文書莊石印的《古文精言》、廣益書局的《童子尺牘》等，雖然數量遠不如吳氏藏書之豐富，但從澎湖、爪哇兩地的華人書籍多購自中國沿海各地來看，似乎 19 世紀下半葉至 20 世紀初，中國沿海各地書局的出版品銷售範圍相當廣泛；此一中文民間書商的銷售網有待學者進一步研究，而爪哇華人吳氏家族的藏書會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分析。

此外，漢學院圖書館典藏有 19 世紀基督教傳教士（Protestant missionaries）的中文著作，目前由該館高柏先生整理，其中亦包括國人較熟悉的傳教士郭士立（Karl G. Tziffl, 1803-1851）的中文著作。郭士立是日耳曼人，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工作，與荷蘭在東南亞的傳教組織關係密切，1830、1840 年代他在中國沿海傳教、旅遊。漢學院圖書館收藏了郭士立 54 本宗教書籍，如《摩西言行全傳》、《聖書註疏》等。（註 14）

## 二、公館檔案

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另一重要的收藏是巴達維亞城華人公館檔案，包樂史教授認為，這是「迄今在東南亞乃至全世界唯一保存最完整的，記載城市華僑社會的史料」。（註 15）這批資料寫作的時間從 1770 年代到 20 世紀中葉，一直由公館歷任的「朱葛礁（秘書）」保管，1970 年代法國歷史學者得知這批史料的存在，後來經由荷蘭的印尼華裔與荷蘭學者的努力，終於在 1995 年入藏漢學院圖書館，相關人士並成立了「The Friends of the Kong Koan Archives Foundation」（公館檔案之友會），推動這些資料的保存與研究工作。

2002 年起，萊頓大學與中國的廈門大學合作，出版「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檔案叢



漢學院典藏的公堂檔案

書」，首先整理與吧城華人民事糾紛案件有關的檔案，書名稱《公案簿》，至 2004 年底共出版 3 輯，第四輯亦於 2006 年出版。

《公案簿》預計有 14 輯，內容按年代先後編輯，加以校勘、標點、注釋。這些檔案雖多以中文書寫，但與法政制度有關的詞彙大半為荷蘭語或馬來語音譯，如敖文明（荷蘭文 Gouvernement，指荷蘭東印度政府）、安坦（馬來語antar，擔保之意）等，此類詞彙甚多，非賴注釋，讀者難以明瞭其意義，目前出版的幾輯《公案簿》均能著力於此，甚便讀者參閱。

此次至漢學院圖書館的公館檔案室參訪，長期參與整理檔案的包樂史教授至哈佛大學客座一年，吳鳳斌教授亦回中國，均緣慳一面。目前檔案室由博士研究生陳萌紅負責管理。陳盟紅亦長期參與整理工作，對此批檔案甚為熟悉。筆者與康培德教授多次前往檔案室看資料，承蒙陳小姐熱心指導，因時間有限，雖談不上研究，亦是儘可能翻閱，瞭解未出版資料的性質與內容大要。

有關吧城公館檔案的介紹文章不少，中文方面，袁冰凌博士在《公案簿》第二輯中，寫有「吧城公館檔案與華人社會」一文，將檔案區分為 8 類，略述檔案的性質與內容；包樂史、吳鳳斌合著的《18 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一書，則是對《公案簿》第一輯的內容進行詳細的分析，並討論《成婚註冊存案》的內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賴貴三教授亦有專文介紹公館檔案，並抄錄存世的公堂牌匾文字，賴

教授在文中又比對了姚楠教授當年的牌匾抄本，甚便參考。（註16）

英文方面，包樂史教授與陳萌紅編的 *The Archives of the Kong Koan of Batavia*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03)，收錄了1999年有關公館檔案的學術討論會論文；最近的介紹文章是2004年在臺灣舉辦的第15屆亞洲歷史學者年會中，新加坡大學Geoff Wade教授發表的 *Chinese Economic Activities in Java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s Reflected in the Batavian Kong Koan Records*，該文係根據《公案簿》第一輯的文件，向英文讀者介紹這批資料的重要性。

除了公館檔案之外，漢學院的公館檔案室另收藏84冊印尼華人商號的帳簿，主要可分為兩類，年代較早者為合發（1866）（註17）、熾昌（1866-1872）、品香（1884-1886）三行號的資料，可能與吧城公館有關。另外為20世紀初期的公司帳簿，以興泉益（1911-1915）與全成（1914-1919）兩家公司最多，各佔38冊，另有源海公司（1911年歷年結冊簿）、順成棧（1911年歷年結冊簿）、興發號（1912年本坡總清簿）、順源公司（1912年年結總錄）、廣通公司結冊（1920-1922）等。

關於帳簿的內容與性質，如以資料最多的興泉益號為例，其帳簿分別有總清簿、山頂總清簿（或俗寫為「部」字）、本坡總清簿、土庫總清簿、實叻入口（幫清）簿（註18）、實叻出口幫清簿、外水總清簿、各埠入口幫清簿、日清簿、辛金雜費簿。

根據這些帳簿資料推估，興泉益號應是經營各類雜貨的進出口與批發零售，類似臺北市大稻埕老街的南北貨行號，唯興泉益號的規模似較大。買賣的貨物有椰干、各式糖、黃豆、麥粉、小牛肉、油等，設有土庫，有總清簿記載進貨項目、數量；在進出口業務方面，設有出口、入口的幫清簿（註19），逐幫記載貨物與運費。根據此類帳簿，可以分析興泉益號與各埠商號的往來錢數、貨物內容，及實際運作情形，如檳榔嶼的泉興棧匯錢來，而興泉益號往往於兩天後出貨。

至於山頂總清簿則是記載批發、零售的業務。另外又有辛金雜費簿，記載厝稅、苦力、伙食等雜支事項。



漢學院典藏的華商「興泉益號」帳簿

這些帳簿資料係流水帳，內容顯得零碎，記錄的時間雖在20世紀初，不過其經營模式應與18、19世紀東南亞華人商號相仿；在前述公堂檔案中，頗多商務糾紛，控告的雙方所提證據即為此類帳簿。所以，漢學院圖書館收藏的這些印尼華人史料，可以讓我們瞭解當時東南亞華人的經濟活動，可以據此探討華人於18、19世紀在中國東南沿岸、臺灣、東南亞各地的商業交易習慣。

### 三、餘論

19世紀荷蘭漢學家活動的範圍多為東南亞（印尼）以及中國沿海，所以初期的研究多集中於中國南方以及東南亞華僑的民俗、民間信仰、社會組織等。20世紀初荷蘭漢學家轉而注意中國傳統思想、文學的研究，特別是中國古代史；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前述研究外，又著重於共產中國的資料收集與研究。但隨著1990年代吧城華人公館檔案的入藏，似乎又讓人回想起19世紀荷蘭漢學家的研究傳統。

此回筆者前往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曾數次至公館檔案室，檔案室的陳萌紅女士目前是萊頓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論文擬寫19世紀吧城華人瑪腰陳永元任職時期，當地華人社會狀況，依據公館檔案與海牙檔案館的殖民地文書等資料撰寫。

筆者與康教授在公館檔案室覽讀檔案之餘，亦與陳女士談及此批檔案收藏的歷史，並論及「公



館」與「公堂」的涵意為何？是否是相同的概念，或各有所指。

一般介紹公館檔案的文章，均混用公館與公堂，如《公案簿》第一輯前言，以1809年甲大陳炳郎建立公館，稱「由此有公堂與公館之分」。又謂吧城公堂即吧城華人公館，或即後來之公館；行文中，亦常見「公堂（公館）」之敘述方式。

袁冰凌試圖解釋公館、公堂混用的現象，謂：「吧城華人首領的辦公處，確切地說應稱為公堂而非公館，許多文獻交替使用這兩種稱呼，與吧城甲必丹辦公場所的變更有關。」（註20）而袁冰凌行文仍混用公堂、公館。

與此問題相關的是，近幾年出版的檔案集，書名是《公案簿》，何以稱《公案簿》？鄙意以為可能是公堂案驗、審斷之簿冊，然不知其詳，且這些公案的記載，究竟始於何時？

一般的看法是《公案簿》的檔案始於1772年，吳鳳斌教授在其有關吧城公館檔案研究的專著中，認為1750年始設朱葛礁，1766年分設大朱、二朱（註21），並謂「目前尚存檔案可知，公堂案簿始於1772年」，謂「此推斷與此後首任馬腰陳永元所移交檔案清冊記載相符」。（註22）

此回筆者至公館檔案室，蒙陳萌紅女士提示前述所謂陳永元移交資料，即目前未刊的檔案中，有1865年12月30日之案件，記載華人原任馬腰陳永元升職為馬腰知廚禮後，「交盤公堂及馬腰物件字頭案簿等」。當時移交的物品，主要有3類，一是陳永元掌管的物件，有大、中銀盤、各式桌椅等物；又有所謂的「字頭」，似乎是指某種文件的存根，如清代臺灣地主發給佃人完租證明，稱為「執照」，執照有原始存根。另外，有相當多的案簿，如婚簿、離婚簿、各州府來吧數簿，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段文字，照原文引述如下：

又交公館案簿從二朱陳玉長官所錄一紙自  
1772年起至1865年止計貳拾本

又交公堂案簿從二朱陳玉長官所錄一紙自  
1787年起至1865年止計參拾本

上述文字中，值得重視的是，公館案簿與公堂案簿是不相統屬的兩種案簿文件，公館案簿記載的時間早，冊數較少，而公堂案簿記載的時間晚了

十五年，但冊數較多。換言之，「公館」與「公堂」在此類案簿中，是各自獨立的概念。

因此，目前出版的《公案簿》史料與上述何種案簿有關呢？在《公案簿》第一輯的「前言」中，是採取前述混用的概念，即認為吧國公堂即吧城華人公館，其檔案起自1772年，終於1978年，其檔案內容多樣，包含了《公案簿》、《離婚簿》、《新客簿》等，但又謂《公案簿》的內容起自1878年，終於1964年。

但參照前引瑪腰陳永元的移交資料中，並無《公案簿》一項，但有《公堂案簿》與《公館案簿》，而《公堂案簿》抄錄內容起自1878年，換言之，目前所出版的《公案簿》，似即所謂的《公堂案簿》檔案。

至於公館、公堂是否可以混用，或者18世紀至20世紀之間，吧城華人頭家們如何使用這兩個詞語，值得同好進一步的研究。

此次去荷蘭萊頓大學參訪，雖然為期只有兩週的時間，但日日行走於萊頓古城街道，又到一些博物館參觀，增添對荷蘭文化的瞭解，所以要再次感謝歐洲文教交流基金會，以及萊頓大學漢學院的諸位友人。草成此文，除了記錄在漢學院圖書館的見聞，以為此行留念，亦藉以答謝友人們的協助之誼。

## 註釋

1. 施利加曾在1858年6月與另一名荷蘭青年至廈門，在荷蘭官方的資助與主導下，他們在廈門學習閩南話，即19世紀南洋華人所稱的「福建話」，直至1861年。見Leonard Blusse, "On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Leiden University's Early Sinologist (1853-1911)", in Willem Otterspeer ed., *Leiden Oriental connections 1850-1940* (Leiden: Brill, 1989), pp. 329-330。同一時期，荷蘭政府派駐廈門的副領事C.F.M. de Grijs亦是一位漢學家，有一些收藏品留在萊頓大學。
2. 施利加此書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e or Heaven-Earth-Leage: a Secret Society



-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出版於1866年，是西方漢學界最早有關天地會的著作，當時中國學術界亦尚未有類似的專著。原著以英文出版，1939年香港薛澄清翻譯成中文，戰後臺灣有刊本（《天地會研究》，臺北：古亭書屋，1975）。
3. 吳榮子，漢學研究在荷蘭，《漢學研究通訊》9卷4期（1990.12），頁255-260。
  4. 不過仍稍遜於美國著名的大學，如普林斯頓大學中文書有40餘萬冊，哈佛大學有30餘萬冊。有關漢學院圖書館的藏書資料蒙雷館長提供。
  5. 有關漢學院圖書館的中文線裝書收藏情形，承蒙在該館工作的高柏（Koos Kuiper）先生多所指教。他向筆者介紹了館內幾類重要的線裝書收藏，如本文談到的高羅佩藏書、吳氏家族藏書、郭士立藏書等。他通曉中國普通話與廣東話，目前持續整理萊頓大學中央圖書館與漢學院圖書館的中文手稿與藏書。
  6. 余文儀乃浙江諸暨人，清乾隆二年（1737）進士。二十九年時職掌臺灣道，復陞福建按察使。在臺任職期間，承襲范咸的《臺灣府志》，續修府志。
  7. 這兩部書均見於1886年G. Schlegel為萊頓大學所編的目錄內。
  8. Leonard Blussé, "On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Leiden University's Early Sinologists (1853-1911)", in *Leiden Oriental Connections*, p. 343.
  9. 包樂史著，庄國士、吳龍、張曉寧譯的《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頁299，譯者譯此書名為《東城記》，應誤。
  10. 近年陳支平主編的《台灣文獻匯刊》刊印此書，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外，已故中西交通史學者方豪曾於1957年9月至萊頓大學參觀，並在漢學院圖書館發現《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一書，係1606年在呂宋刊刻的漢籍珍本，亦是該館的重要藏書，參見方豪，萊頓漢學院藏呂宋明刻漢籍之研究，《東方雜誌》，復刊第6卷第12期，頁23-38。
  11. Liang-Wai Chan, "The Go Collection of 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 at Leiden University: a Survey of a Peranakan Chinese Businessman's Book Ownership" (M.A. thesis, Leiden University, 2003), pp. 18-19.
  12. Liang-Wai Chan在其碩士論文之附錄，條列此批書籍的書名、編作者、出版者、出版年等資料，可參考。
  13. Schlegel認為在印尼遇見最有學問的中國人，約略等於中國國內普通的塾師。見Schlegel著、薛澄清譯，《天地會研究》，頁4。
  14. 本段資料均由高柏先生提供，感謝他提供此一訊息。
  15. 包樂史，序，見袁永凌、蘇爾夢校注，《公案簿》第二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頁1。
  16. 賴貴三，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典藏印尼華僑「吧國公堂」檔案暨匾聯木牌考釋校記，《國文學報》，35（2004.06），頁213-241。
  17. 括弧內數字是資料所屬年代，以下同。
  18. 實叻，又稱石叻、叻，乃新加坡古名，即馬來語的Selat，原意為海峽，見聶德寧等校注，《公案簿》第三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頁362校注。
  19. 「幫」字指的是船期，每一次的船期即編為第某幫，今臺灣鶴佬語猶稱火車車次為幫。
  20. 袁冰凌，吧城公館檔案與華人社會，收入袁永凌、蘇爾夢校注，《公案簿》第二輯，頁2。
  21. 朱葛礁，或作諸葛礁，即荷蘭文的secretaris，意即書記員或秘書，有大朱、二朱之分，二朱乃副書記員。見袁永凌、蘇爾夢校注，《公案簿》第二輯，頁436。
  22. 包樂史、吳鳳斌合著，《18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廈門：廈門大學，2002）頁17。